

清代山西解州城的商业^{*}

——以关帝庙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乔南

内容提要:解州城是清代山西南部的一座商城,亦为晋、陕、豫三省物资汇聚之地。该城始建于隋,兴起于明,清中叶以后发展迅速。彼时,解州城内商号众多,金融、药材、粮油、纺织业等为较重要之行业。解州城外关帝庙号称关庙之祖,历朝政府对其不断加封、拨款重修,前来拜谒之人络绎不绝。每年举行的数次规模盛大之关帝庙会,吸引山西本省及河南、陕西客商来此交易。繁荣的商业与盛大的庙会经济有机结合,形成了解州独有的商业特色。本文拟利用现存于解州关帝庙的碑铭资料,并结合其他传统文献,对清代解州城商业的发展脉络及特点进行梳理。

关键词:解州城 商业 关帝庙 碑刻资料

一、引论

解州城,明代为平阳府属解县县城,清雍正二年(1724)随解县升直隶州而成为州治,现为山西省运城市解县城,是清代山西著名的商镇,亦为三国名将关羽故里、关帝祖庭之所在。该城位于山西南部的汾河谷地,东临河东盐池,西控蒲津关隘,北枕中条山脉,位于晋陕通衢之上。清代,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商品流通的扩大,解州城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但相关文献记载较少。不过,数次商民参与捐修的关帝庙得到较完好的保存,其内所存数十通碑铭,记录了历代对该庙的敕修及加封情形。其中,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重修解州关圣庙记》及同治九年(1870)《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重建春秋楼并炮楼四坊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并建炮楼六路地亩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一)》《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二)》《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三)》《重建春秋楼本州绅民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布施碑记》等数通碑铭,较完整地记录了乾隆二十七年及同治九年重修关帝庙的捐银商号、人名、金额等信息,为我们了解清代解州城的商业提供了珍贵资料。^①

国内使用碑刻资料对商业城镇进行考察以许檀的研究为早,她利用前人较少使用的、散落各地的碑铭,对众多清代商镇进行个案分析,为该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视角。^②对于

[作者简介] 乔南,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教授,太原,030006,邮箱:xuqiaonan1978@126.com。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集聚视角下的清代山西城镇研究”(批准号:12CJL009)、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晋商及其商业资本对明清山西乡村城市化的推动及当代意义”(批准号:2014330)阶段性成果之一。向匿名评审专家致谢。

① 2013年8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许檀教授慷慨地将这批由她亲赴解州关帝庙收集的珍贵碑铭资料赠与笔者,在此向许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就笔者所见,这些碑铭资料迄今未有被系统使用过。

② 相关成果参见《清代中叶聊城商业规模的估算——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明清时期豫北的商业重镇清化——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明代河南清化镇的商业规模——隆庆五年〈创建金龙大王神祠记〉及相关碑文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清代河南西部的商业重镇荆子关——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清代的雁门关与塞北商城——以雁门关碑刻为中心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清代解州城的研究,目前所见文献多集中于对关帝信仰或关公文化问题的探讨,有关其商业发展的研究则稍显薄弱。^① 本文拟系统利用上述碑刻资料,并参考其他文献,对清代解州城的商业进行个案研究,以期对其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

二、解州关帝庙及解州城的商业

解州城,距省治太原 930 里。于隋大业九年(613)自解梁故城徙于此,元至正间重修,明洪武初展筑,经景泰、成化、弘治、正德重修后,成为高 6 丈、厚 3 丈 5 尺、池阔 2 丈 5 尺、四门各建城楼、四隅各建角楼的城池。该城地当要冲,紧邻河东盐池,故兴起较早,明成化《山西通志》即有解州城“百商往来,万货贸易”的记载。^② 清代,该城周长“九里十三步”,其四门“东曰长乐、西曰崇宁、南曰镇山、北曰永安”。^③ 城内设州署、吏目署、试院、四县公馆、^④ 仓舍、养济院等机构,以及礼贤、崇凝、镇山、泰康四坊;城外则设管理盐政的长乐巡检司、盐池巡检司以及保护州城的驻外委千总署等衙门。乾隆五十八年,解州城“商贾云集,百货具陈”,游历于此的李遂在《晋游日记》中赞曰:“地称形胜,池玉碗琼,地不爱宝,民生裕焉”,^⑤可见当时解州城繁华之一斑。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⑥为中国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代表,于宋代被神化,至明清已升职为万能之神,更被清廷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其地位远超出一般英雄,上升到庇佑忠良、保护财产的“武圣”高度,与“文圣”孔子并称,为民众、特别是商人所推崇。关帝庙,又称关圣庙,为关庙之祖庭,位于解州“城西外百步,南面条山,北负硝池”。^⑦ 该庙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重建,此后历经多次地震、战争、火灾,屡毁屡建。康熙四十一年(1702),庙内大火,历十载重修,即现存建筑。庙以东西向街道为界,分南北两部分:街南称结义园,街北为正庙。正庙坐北朝南,仿宫殿式布局,分前院和后宫:前院依次是照壁、端门、雉门、午门、“山海钟灵”坊、御书楼和崇宁殿,两侧为钟鼓楼、“大义参天”坊、“精忠贯日”坊、追风伯祠;后宫以“气肃千秋”坊、春秋楼为中心,左右有刀楼、印楼对称而立,全庙共殿宇百余间。

据现存庙内的碑铭以及光绪《解州志》的记载,可以知道关帝庙在元代及之前重修 5 次,明代重修 13 次,^⑧清代重修 11 次,且绝大多数由官府主持。囿于资料所限,有关元代及之前重修关帝庙的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闫爱萍《地方文化系统中的关帝信仰——山西解州关帝庙庙会及关帝信仰调查研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宣朝庆《关公信仰与商人精神——一种基于宗教社会学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包诗卿《明代关羽信仰传播基础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田海林《“忠义”符号: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岳祀典》,《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林文辉《从东山关帝庙看海峡两岸关帝信仰文化》,《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4期;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传播与接受》,《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高琳《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石硕《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清代至民国时期巴塘关帝庙内涵之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② 成化《山西通志》卷6《风俗》。

③ 乾隆《解州全志》卷3《城池·坛庙》。

④ 清代,解州直隶州下辖安邑、夏县、平陆、芮城等四县。

⑤ [清]李燧、李宏龄著,黄鉴辉校注:《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⑥ 光绪《解州志》卷8《人物》。

⑦ 乾隆《解州全志》卷3《城池·坛庙》。

⑧ 乾隆《解州全志》卷3《城池·坛庙》载:“元祐七年知州张杲之修,县尉郑咸记;金世宗大定三年,管军范公重修,郡人南涛记;泰和四年重修,知州田特秀记;元泰定元年重修,学士王纬记;至正二十五年,郡人蔡荣等重修。明洪武元年重修,李永常记;成化十四年,知州张宁重修,周洪谟记;正德五年,知州李文敏重修,尚书韩文记。嘉靖间,巡按王秀重修,巡盐御史朱实昌记;知州孔天叙重修,御史王忬记;知州解情重修乐楼,都宪唐顺之记;知州樊问仁重修,郡郎中邱东鲁记;三十七年,地震庙毁,知州王维宁重建,大学士张四维记。隆庆间,重修午门、重修乐楼。万历间建麟经阁;十八年,敕解州庙额英烈;三十六年重修,有记。三十八年,敕修有记。”

具体细节目前不得而知。对于明代关帝庙的修建方式及资金来源,可从相关文献有所了解。天启元年(1621),《新创莲池记》曾有因“香火抵充国锐”而使关帝庙“累年缺修补费”的记载。^①崇祯间,关帝庙的重修是“捐金施舍者云集”,共襄盛举而成。^②由此可见,明代解州关帝庙的重修经费来源应为香火收入及民众捐款。

清代,重修关帝庙的方式似乎有所改变。据康熙五十六年《飭永禁霸截山水侵占关庙廊房碑记》载:“自康熙二十八年为始,但属庙内廊房、乐楼、午门、碑亭、牌楼、川廊等处地址,悉归庙内收赁。公贮庙库所收银数……或公存,为香火、修理之用,抑或积为五年小修,十年大修,著为定例,使神庙永无颓塌渗漏之虞。”又载:“康熙二十九年奉抚院批;按察司飭将关帝庙会场租税银两,着管庙道人经收,修葺庙宇,不得侵吞。”^③此外,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亦曾有“帝庙每年房地租银为数略计二千两”的记载。^④可见,康熙朝对于关帝庙的管理及修缮与同治朝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以寺庙租金收入作为重修的主要经费来源。另康熙五十六年《飭永禁霸截山水侵占关庙廊房碑记》还有本地“土人”因“从前曾经修过”关帝庙,遂将廊房等庙内建筑据“为己业”的记载。^⑤在随后几次关帝庙重修中,更有大量绅民商贾的捐修记录。由此可知,民众捐修也是关帝庙重修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此外,光绪《解州志》载:康熙四十二年“圣祖西巡临解,费帑金一千两”,对关帝庙进行重修,^⑥故官款亦为重修来源。综上可知,清代重修关帝庙的经费,主要源于关帝庙会场租税银两、捐助及官款等多个方面。

表1对清代关帝庙的11次重修和扩建进行了统计。从中可知,清代前期对关帝庙的4次重修,并没有商人捐资或参与修修的明确记录,商人或许参与其中,但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至乾隆二十七年,商人始成为关帝庙重修的主力,并在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嘉庆十四年、道光五年及同治九年的5次重修中贡献了十分重要的力量,其捐款也成为重修资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充分表现出其间商人实力的增强。

若以耗银数额为标准来判断重修规模之大小,则以康熙四十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嘉庆十四年、道光五年和同治九年的规模较大。其中,以嘉庆十四年为最。但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能充分了解嘉庆间重修捐银的具体情况。乾隆二十七年与同治九年的重修规模虽略小于嘉庆十四年,但捐银及重修情况却被以碑铭形式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使我们可以从中拣选相关信息对解州城商业进行初步分析。

由图1所示清代解州城关圣庙重修之布施分类情形可见,同治九年的各类捐银数量以及捐银总量规模均超越了乾隆二十七年。此外,在乾隆二十七年的捐银中,城内四关绅民及官员所占份额最多,商人及商号捐银不及城内四关绅民和官员,仅与六路地亩绅民捐银相当,其份额仅占总捐银额的1/4强。俟至同治九年,商人与商号的捐银明显多于其他两类人群,其份额也提升到总捐银额的64.3%。由此可推断,同治间解州城内商人数量及实力应较乾隆间有所增长。

据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载,该次重修采取“延门劝募”的集资方式,因此碑刻上所载商号均为解州城内的字号。计有当铺、钱局、票号、茶行、药材行、粟店、油店、粉局、木厂、香房、金银局、皮箱局、靛行、草帽行、扫帚行、山货行、线行、麻行、缎店、针行、油布局、夏布行、玉器行、纸局、花炮局、烟行、盐店等。其中不乏一些具体字号的记载,参见表2。

① 《新创莲池记》,张正明、[英]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② 《重修关帝庙寝殿金身碑记》,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273页。

③ 《飭永禁霸截山水侵占关庙廊房碑记》,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279页。

④ 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碑存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关帝庙。

⑤ 《飭永禁霸截山水侵占关庙廊房碑记》,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279页。

⑥ 光绪《解州志》卷3《坛庙》。

表 1

清代解州关帝庙重修统计

单位:两

| 时间 | 修缮项目 | 商人捐银数额 | 花费款额 |
|---------------------|---|-----------------------------------|----------|
| 康熙四年 | 重修 | 不详 ¹ | 不详 |
| 康熙四十二年— 康熙五十二年 | 因庙灾而敕修 | 无 | 帑金 1 000 |
| 乾隆十八年 | 大加修葺 | 不详 ² | 不详 |
| 乾隆二十三年 | 于莲花池遗址开东西两池,筑君子亭 | 不详 | 不详 |
| 乾隆二十七年 | 改八卦楼为御书楼,又改麟经阁前楼为刀印两楼,厘整匾额,修理东西大坊,庙南改建结义园、功德祠,又于庙西大路北建立关夫子故里碑亭 | 运司商人、四月会客商、州城四关商人共捐银 1 859.227 两 | 6 572.16 |
| 乾隆四十二年 | 修结义园前后三池,阁后面渠筑三楹,环以长廊,辅以夹室。两池之旁各建舟亭。将关帝庙内御书楼、大殿、乐舞楼、午门、两庑画壁、钟楼、庙城及门东西坊两重,次第修理 | 不详 | 不详 |
| 嘉庆十四年 (1809) | 统庙内外,重新之。增建正殿、西钟亭,大门外廊 30 余间,并照壁两旁花墙 | 不详 | 28 000 |
| 道光五年(1825) | 倾者扶之,缺者补之,漫口者修饰之。自殿庑行廊以及坊壁台砌,去故取新,坚固壮丽如昔 | 运商与往来行商捐银 7 000 两 | 7 000 |
| 咸丰九年(1859)— 同治九年 | 重建春秋楼,将圣母殿、午门、刀印楼及各庙宇、廊房、牌门、楼阁、结义园等逐一翻新,并重修常平关帝家庙 | 从盐纳募得 7 000 两,其余商号及商人捐银 8 416.2 两 | 23 958.3 |
| 光绪元年 | 重修鼓楼 | 无 | 不详 |

资料来源:根据光绪《解州志》卷 3《坛庙》、乾隆二十七年《重修结义园记》(碑存山西运城市解州关帝庙)、乾隆四十二年《重新大庙增修结义园记》(碑存山西运城市解州关帝庙崇宁殿廊下)、道光五年《重修关帝庙碑记》(碑存山西运城市解州关帝庙崇宁殿廊下)、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碑存山西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春秋楼廊下)、同治九年《重建春秋楼并炮楼四坊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并建炮楼六路地亩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一)》《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二)》《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三)》《重建春秋楼本州绅民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布施碑记》(碑铭均嵌于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刀楼及印楼墙内)相关内容整理。

注:1. 对于康熙四年关帝庙的重修,光绪《解州志》卷 3《坛庙》仅记载:“国朝康熙四年陕抗曲沃贾汉复重修,郡翰林学士乔廷桂记”,并没有写明资金来源,故此重修商人捐款及数额记为“不详”。

2. 关于乾隆十八年关帝庙重修,光绪《解州志》卷 16《艺文·重修解州关圣庙记》有“督率绅士,共襄斯役”的记载,因此,此次重修的资金来源中是否有商人捐款,尚不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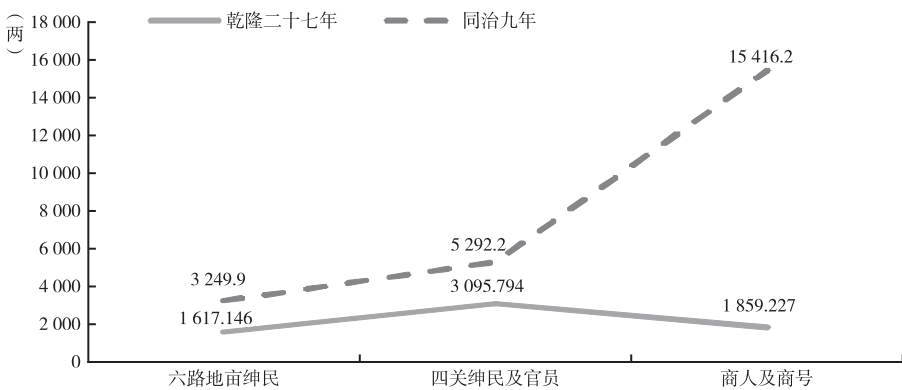


图 1 乾隆二十七年及同治九年重修解州关圣庙布施分类统计情形

资料来源:根据乾隆二十七年《重建解州关圣庙记》(碑铭嵌于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墙壁内)、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碑存山西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春秋楼廊下)、同治九年《重建春秋楼并炮楼四坊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并建炮楼六路地亩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一)》《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二)》《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三)》《重建春秋楼本州绅民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布施碑记》(碑铭嵌于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刀楼及印楼墙内)有关数据整理。

表 2

同治九年重修关帝庙捐银行业分类统计

| 行业 | 字号名称 |
|-------|--|
| 盐业 | 福生盐店 |
| 当铺 | 通泰当、永隆当、充益当、闻喜当行、曲沃当行 |
| 钱局 | 隆盛钱局、永盛原钱局 |
| 票号 | 百川通、蔚泰厚、日升昌、元丰玖、志诚信 |
| 茶行 | 天德茶行、公兴茶行、天顺茶行、通裕茶行、和顺茶行 |
| 药材行 | 京药行、协和药店 |
| 粟店 | 兴盛粟店、金井庙粟行、新兴粟店、永昌粟店、永成粟店、协泰粟店、新升粟店、福德粟店、聚德粟店 |
| 油店 | 三和油店、泰盛油店、新兴油店、协盛油行、顺诚油店 |
| 粉局 | 口昌粉局、常盛粉局 |
| 木厂 | 同心木厂、隆信木厂、山生木厂、庆祥木行 |
| 香房 | 丰盛香房、两益香房、永兴香房、诚盛香房、双盛香房 |
| 金银局 | 隆盛金局、魁盛金局、万和金局、太和银局 |
| 皮箱局 | 二合皮箱局、仁义皮箱局 |
| 靛行、染房 | 中兴靛行、锦瑞靛行、昌兴染房 |
| 其他 | 草帽合行、复盛扫帚行、闻喜山货行、夏县线行、义成缎店、全盛油布局、谦裕夏布行、皮绳行、玉器行、资深纸局、魁盛纸局、新兴纸局、天成花炮局、公正菸行、白货行、三盛帽铺、新盛面店 |

资料来源:根据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碑存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春秋楼廊下)、同治九年《重建春秋楼并炮楼四坊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一)》《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二)》《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三)》《重建春秋楼本州绅民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布施碑记》(碑铭均嵌于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刀楼及印楼墙内)有关内容整理。

此外,还有若干无法直接从名称看出经营行业的字号。经统计得知,彼时共有 784 家字号及客商参与捐银。由此推算,同治年间解州城内店铺的数量起码应在七八百家以上,若再加上各种类型的市集商贩,解州商业店铺的数量就比较可观了。及至民国初年,由于解州北部“新绛商务盛”及铁路交通发展的影响,解州城的商业地位大不如前,即便如此,彼时解州城内仍有商户“六百四家”、商人“三千二十名”,^①其商业之盛亦可由此管窥一斑。

解州关帝庙为全国关帝庙之祖庭,拜谒之人络绎不绝。每年举办正、四、七、九、十一、十二月等数次规模盛大的庙会,吸引本省及邻近陕西、河南等省客商“来解会买货”。^②其中,以四月和九月庙会规模最大,称为大会;其余规模稍逊,称为小会。大会会期 1 个月,小会亦各有期。每遇过会,关帝庙内外“商贾云集,百货具陈”,^③人声鼎沸,月余不衰,更有名伶演剧助兴。解州关帝庙会因而成为彼时山西四大庙会之一。^④解会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除江南丝绸、江西瓷器、珠宝古玩及裘皮之外,还有蒙古马匹、四川药材、湖北竹木器具等,而以牲畜、农具及当地物产为主的日用百货也在庙会交易中占据相当份额。民国《解县志》记录当地特产“黄丝”时,就有“黄丝,妇女勤者饲蚕作茧取丝成绢,朴素无花,六月二十三日关庙赛会贸鬻成市”的记载。^⑤

因资料所限,我们无从知晓庙会交易的客商具体数量,但可以通过康熙五十六年重立康熙二十

① 民国《解县志》卷 3《商户》。

② 民国《解县志》卷 2《生业略》。

③ 李燧、李宏龄著,黄鉴辉校注:《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第 75 页。

④ 乔南:《浅析清代山西农村集市及庙会》,《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

⑤ 民国《解县志》卷 2《物产略》。

八年《飭永禁霸截山水侵占关庙廊房碑记》及同治九年《重修关帝庙碑记》的相关记载对庙会交易情况进行了解。每遇庙会之期,前来交易的客商或赁取关帝庙廊房充当铺面,或赁取本地人在“庙内地基”自备“芦席、椽木、绳索”搭盖而成的简易摊位。^①客商在向关帝庙值年董事领取执照并登记备案后,方可卖货。彼时,仅廊房一项,即包括庙内大小廊房241间,庙外钟鼓楼内廊房38间,西洞门外廊房23间,还有东西大廊房、东西筒瓦房等。再加上东洞门外及庙内外各处地基等(即当地人自搭的简易摊位),^②则解会交易的铺面及摊位总数在300个以上。若全部租赁一空,则前来解会的客商应有300多家,再加上本地商号,数量应远不止此。

此外,康熙五十六年重立《飭永禁霸截山水侵占关庙廊房碑记》提到,“仍照往规听其搭盖,只输地租,以供庙用”,可见在康熙年间,甚至更早,当地人就于庙会期间在关帝庙内地基私自搭盖摊位,赁与“四外客商”,^③而寺庙管理者则向其收取地租,以资庙用。如前所述,庙会期间的廊房、摊位租金是关帝庙的一项重要收入,这部分收入除去祭祀等费用外,每年可存留1000余两,用于大修关帝庙、荒年赈济灾民或资助解梁书院生童膏火等项。^④

值得注意的是,关帝庙重修中曾多次出现与会客商的身影。据乾隆二十七年《重修解州关圣庙记》载,此次重修施银总数为6572两1钱6分6厘,其中“四月会客商共捐银二百零三两六钱一分七厘,细行廊租二百八十九两,故衣行廊租一百七十四两一钱五分,又捐银一十二两”,^⑤即与庙会有关的捐款共有678两7钱6分7厘,占全部捐款的10.3%。另据同治九年《重建春秋楼客商捐修廊房碑记》载,彼时有39家客商参与重修,共捐银1587两,占全部捐款6.6%。由此可知,庙会客商是两次重修关帝庙捐款的主要力量之一,这不仅折射出关帝庙会的盛大,亦反映出租金收入是关帝庙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商人踊跃参与捐修的情形,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关帝庙管理、运营方式的一种补充。

综上所述,从解州关帝庙会的举办频率、庙会廊租收入、客商捐银等情况,我们可以知道解会客商人数众多,商品交易规模可观。另外,解州城内的繁华商业除满足当地消费外,有相当的份额是参与庙会或与陕、豫客商进行交易。

三、解州城市场的行业分析

繁华的商业及庙会表明解州城内有大量商品在流通。根据同治九年有关重建关帝庙碑刻资料显示,除盐纲外,该城捐资者分类统计情况为:捐银100两以上者有11家,共捐银1514两;捐银10—99两者有261家,共捐银6043.4两;捐银10两以下者有512家,共捐银858.8两。其中,单个捐银最多者捐256两,最少者捐400文,一般多为3—8两,784家合计捐银8416.2两。^⑥

同治九年重修关帝庙的集资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从盐纲募集;其二,对绅民商贾进行“延门劝募”,并以“或计资,或按地,或分铺户”的标准来确定“施助多寡”。因此,我们可以从具体捐银数额来对彼时解州城的行业及经营情况进行考察。

首先,我们来看盐纲。从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可以知道,咸丰九年,前道台杨铁臣从“盐纲筹银三千两”,用以重修关帝庙,但因“经费不敷尚钜”,又向“土庶客商,或计费、或按地、或分铺户定施助之多寡,共集银一万四千五百余两”。工程持续至同治六年,又因“工多费钜”,仍“尚未

① 《飭永禁霸截山水侵占关庙廊房碑记》,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279页。

② 同治九年《重修关帝庙碑记》,碑存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关帝庙。

③ 《飭永禁霸截山水侵占关庙廊房碑记》,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279页。

④ 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碑存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关帝庙。

⑤ 乾隆二十七年《重修解州关圣庙记》,碑存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关帝庙。

⑥ 据清同治六年“制钱1500文折银1两”计算而得,参见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告成”。随后“李道宪仍从盐纲绩筹银四千两”，从而使工程于同治九年竣工。由上可知，此次关帝庙重修，曾先后两次从盐纲筹款，共筹得7000两白银，占花费总量的32.6%。

盐纲，即成批运输食盐的组织。解州城紧邻河东盐池，曾为河东盐西场分司所在，亦位于河东盐运陕的必经之路，故“鬻鬲之夫率趋盐利握算，佣工不务本业”，^①解州城及周边地区有大量从事盐业生产、运输及相关行业的商人存在。运盐存在风险，盐纲常年从事河东池盐的贩运生意，自然希望关帝保佑盐运安全、生意兴隆。重修关帝庙捐资就数次出现从事河东池盐生产及销售的运商及坐商的身影：乾隆二十七年重修关帝庙时，运司商人捐银800两，^②占捐银总数的12.2%；道光五年的重修，运司商人与往来行商共捐银7000余两；^③至同治九年，历时十数年的重修更是先后两次从盐纲募得白银7000两。不仅如此，盐商还曾参与康熙及道光年间关帝家庙的重修，^④可见盐商在当地实力强大，盐业为解州地区的重要行业。遗憾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判断彼时解州城盐店的具体数量及捐银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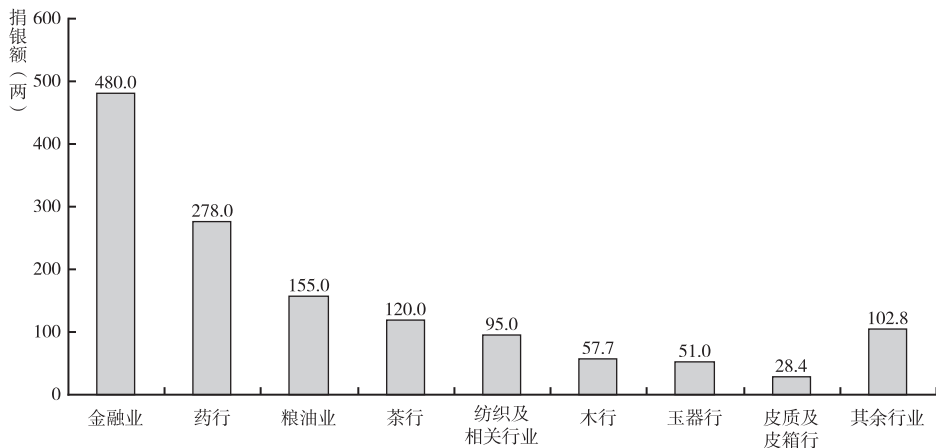


图2 同治九年重修解州关帝庙商号捐银数量分类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碑存山西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春秋楼廊下）、同治九年《重建春秋楼并炮楼四坊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并建炮楼六路地亩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一）》《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二）》《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三）》《重建春秋楼本州绅民布施碑记》《重建春秋楼布施碑记》（碑铭均嵌于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刀楼及印楼墙内）有关数据整理。

再看绅民商贾的捐银情况。图2为除盐业外，其余捐款较多行业的统计情形，从中可以看出金融业在所列行业中捐银最多。彼时，解州城的金融业包括当铺、钱局和票号。当铺和钱局是早于票号出现的金融机构，主要从事质押典当及银钱兑换业务。票号产生较晚，以道光三年平遥日升昌的创办为标志，主要从事远程大额汇兑业务，按总号所在地可分为平、祁、太三帮。据同治九年《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可知，平（遥）帮票号百川通、蔚泰厚、日升昌，祁（县）帮票号元丰玖，太（谷）帮票号志诚信等设在解州的分庄均参与了重修捐银，而知名票号在解州城设庄也体现出该城商业的重要地位。

药行捐银278两，位列第二。山西本省主要出产甘草、党参等药材。^⑤“大黄、黄蓍、甘草、枸杞、黄芩、车前、泽泻、蒲黄、木贼、艾蓬、蒲公英、白蒺藜”等药材“为蒙古物产，大宗所在有之，多运入内

① 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2《风俗》。

② 乾隆二十七年《重修解州关圣庙记》，碑存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关帝庙。

③ 道光五年《重修关帝庙碑记》，碑存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关帝庙。

④ 《募修常平关夫子庙引》，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275页；《重修关帝庙暨祖莹陵寝碑记》，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第313页。

⑤ 道光《阳曲县志》卷2《舆地图下·方产》。

地”。^①此外,陕西亦为著名药材——大黄的产地。^②故药材行所营药材除山西本省所产外,还有不少产自蒙古或陕西。

捐银总数列第三的粮油业,包括粟店、粉局、油店和面店。粟是未脱壳的小米,产于我国北方黄河流域,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解州所辖夏县盛产粟,且该县民众俗尚商贾,有“民俗赴末者众,每新谷登场,量存一家口食,余即棗卖,以作资本,外出贸易,……粮食转贩他处”的记载。^③从经营粟米的店铺参与捐资的数量及捐银数额均较多的情况看,粟米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粮食,且市场需求量较大。由于当地“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④所以“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居民之用。必仰给于河南、陕西二省”。^⑤陕西关中粮食向来是山西粮食的主要来源之一,仅乾隆八年关中麦熟后的1个月内,已运销山西“不下二十万石”。^⑥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向朝廷汇报山西粮食来源明确提到,同治以前“平、蒲、介、绛以陕西米麦为大宗”。^⑦关中粮食经渭水入晋是一条传统输粮路线。渭水眉县以东便可行舟,沿黄河输入汾水多用“漕粮小船”。早在康熙四十四年,晋省就捐造百只漕粮小船,在汾河往返试行,以资运粮。^⑧此外,河套粮食亦沿黄河南下至蒲、绛等州。虽然此段黄河为季节性航道,一年仅有6个月可行船运粮,但利用黄河水运运输口外余粮一直是清代解决晋中南地区缺粮问题的重要途径。^⑨乾隆初年,归化城利用“牛皮混沌”编筏装米,沿河而下,至壶口起岸陆行10里复行装船,运至晋南。^⑩乾隆中后期,赴归化粮贩多造小型“圆底船”运粮,以便通过急流、漩涡,至壶口连船起运陆行后再下水,至禹门镇移米入平底大方船,再运至荣河、永济境内。^⑪虽然沿水运而来的粮食并没有直接到达解州,然此地西接蒲州、北接绛州,故碑铭所镌粮店所营粮食除本地所产外,大都来自陕西关中及口外归化各厅。此外,位于解州北部之绛州盛产“绵种、芝麻、菜籽等榨油上料”,^⑫位于其南部的河南洛阳也是油料产地,所产麻油、草麻油、菜籽油、红花子油、芝麻油等数种土产,“邻省资之”,^⑬故油料应多来自绛州及河南洛阳。

茶行共有5家,捐银总量位列第四。清代,山西商人远赴福建及湖北贩茶,“茶叶之路”纵穿山西北上归化城,南茶由位于山西东南部的泽州入晋。^⑭解州位于晋南,并非运茶孔道,然此地茶庄捐银数额较大,故应以供应本地消费为主,兼有部分供应庙会交易。位列第五的木业,主要有柏木行和木厂两类商号。捐银位列第六的纺织及相关行业,包括线行、麻行、缎店、针行、靛行、油布局、夏布行、染坊、花店、帽铺等。解州地处汾河谷地,农业条件较好,棉花种植广泛,人口稠密,因此纺织及相关行业发达。玉器行捐银排名第七,由于解州及周边地区不产玉器,故所营商品应来自外地,本地以消费为主。皮货及皮箱行捐银排名第八,与解州毗邻的绛州城为清代及民国时期山西重要的皮货产地,“产

① 光绪《蒙古志》卷3《物产》。

②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中),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7页。

③ [清]鲁九皋:《鲁山木先生集·稟后众水平稟事宜》,转引自张正明、薛慧林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④ [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1《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9—600页。

⑤ [清]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3《请开余禁疏》,清光绪十四年刊本。

⑥ 叶志如:《乾隆朝米粮买卖史料(上)》,《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⑦ [清]曾国荃:《曾文襄公奏议》卷8《申明栽种罌粟旧禁疏》,转引自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⑧ 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⑨ 叶志如:《乾隆朝米粮买卖史料(上)》,《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⑩ 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⑪ 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⑫ 民国《新绛县志》卷3《生业略》。

⑬ 乾隆《洛阳县志》卷2《物产》。

⑭ 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

皮货甚多,……有皮衣、皮裤、皮脊、皮弦、皮条各种”,^①且销路甚广,故皮货及皮箱等商品来自绛州者多。其余行业包括扫帚行、山货行、金局、纸局、香房、花炮局、百货行等,大多是为本城商民提供日用所需的商品。

四、余论

解州城兴起于明代,清雍正间升为直隶州治后,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并于清中叶达到鼎盛,商号数量当有数百家。每年于解州关帝庙举行数次规模宏大的关帝庙会,吸引了众多本省及陕、豫客商前来交易,从而形成了解州城繁荣商业与盛大庙会相契合的独有商业特色。

陕、豫两省与解州相邻,故于解州经商的人除本省外,以此二省为多。盐、金融、药材、粮油、茶、木材、纺织、皮毛等业是解州城商业中较为重要的行业。解州城不仅为山西南部一个直隶州的商业中心,同时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晋陕豫物资交流的重要舞台。同治间,解州城较为活跃的行业为金融业。输入商品以产自口外及陕西的药材、豫陕米粮、南茶及绛州皮毛为大宗,其中有相当部分米粮转运晋省中部缺粮地区,其余如药材、茶、皮毛等商品亦随庙会及商业而转运他处。

从现有资料看,乾隆二十七年、嘉庆十四年、道光五年和同治九年等数次关帝庙的重修均采用集资方法,其中仅同治九年采取“或计费、或按地、或分铺户”的方法来“定施助之多寡”,^②但未将集资标准列出。其余几次重修集资,无论行商、坐贾,均系认捐,故对商号经营规模的估算难度较大。因此对清代解州商业更为准确、深入的考察还有待资料的进一步发掘。

History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he Haizhou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Qiao Nan

Abstract: Haizhou city was a mall in the south of China during Qing dynasty. It was also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center and the birthplace of the Guandi temple. The Guandi temple was decorated and repaired again and again in all dynasties. Haizhou city was built in the Sui dynasty, developed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expanded quickly after the mid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thousands of shops and merchants in the city. The temple fair was host every year. It attracted more merchants who come from Shanxi province and Henan province, then forme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ocal commence. In this paper, we want to investigate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Haizhou city in the Qing dynasty by using the Guan Yu Temple inscriptions data.

Key Words: Haizhou City; Business Development;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民国《新绛县志》卷3《生业略》。

② 同治九年《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碑存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关帝庙。